文献考证、比较研究与汉语方言语法史*

——评郑伟著《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

盛 益 民

提　要：本文为郑伟所著《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一书的书评。文章就书中提到的文献考证和比较研究这两种方法在汉语方言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效度问题做了讨论。同时，文章也提出了汉语方言语法史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　文献考证　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语法史

〇　引言

华东师范大学郑伟教授所著《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以下简称《研究》），2017年3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为该社“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种。《研究》以语法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在文献考证、历时-共时比较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吴语虚词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是一部吴语语法史（尤其是虚词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绪论”部分对吴语、吴语历史语法研究、语法化理论等背景做了介绍；第二章到第七章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前五章依次考察了指示词、时间表达词、趋向词、连-介词、被动标记五大专题，第七章专门从吴闽比较的角度考察了虚词的演变问题；第八章是全书的总结。书后附有一份索引（包括术语、重要文献、人名等）及四个附录（附录1 各地吴语指示词一览表，附录2 各地吴语相关虚词对照表，附录3 吴语代表方言语法例句对照，附录4 吴语早期文献选录），尤其附录3提供了当涂$_{湖阳}$、常州$_{湟里}$、常熟$_{梅李}$、苏州、杭州、绍兴$_{柯桥}$、义乌$_{佛堂}$、台州$_{路桥}$、开化、温州10处吴语100条例句的对照表，是吴语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汉语方言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相较于通语语法史，方言语法史不论在研究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还有不小的差距。产生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方言语法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基础、研究队伍也较为薄弱；另一方面，方言语法史研究所涉及的观念（方言史观）与方法问题也更为复杂。早期的方言语法史研究多是将官话文献作为方言语法现象的直接源头，利用官话文献来梳理方言现象的历史演变。不过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方言有其自身产生、演变的历史，不能简单直接地把官话历史文献作为方言现象的源头。伴随着观念的改进和方法的更新，方言语法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7-12-11；定稿日期：2021-10-20。

* 本文得到教育部后期资助 2021 年度一般项目（21JHQ035）、上海哲社 2021 年度一般项目（2021BYY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301）的支持。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承蒙曾南逸、卢笑予两位的指教。《语言学论丛》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第2期最终.indd 153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在语法演变研究方面，学界使用到的主要方法有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法、历时类型学等。就汉语方言语法史的研究而言，大致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考察：①通过方言的历史文献中所反映的差异来考察语法演变，当然，必须利用本方言的历史文献来进行方言史的研究，通语的文献只能作为参照；②通过亲属方言的比较来探寻语法演变的方向与过程；③通过同一个方言共时的语法面貌或者共时的语法变异来构拟语法的历史演变；④基于跨语言研究得到的普遍演变路径，来构拟某个语法现象的历史。《研究》第288页把第一种称为文献考证法，把第二、三两种称为历时-共时比较法（方便起见，本文径用“比较研究”来概括）；第四个角度《研究》虽未提及，不过可对前三种方法进行补充或者为其提供跨语言的背景支持。

《研究》为方言语法史（尤其是吴语虚词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蓝本，本文主要打算结合《研究》中所使用到的研究方法，对汉语方言语法史尤其是吴语语法史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效度等相关问题做一探讨，最后提出研究展望。

一 文献考证与方言语法史研究

1.1 文献在方言语法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文献在语言历时研究当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学界的普遍认识。（Harris and Campbell 1995；Campbell 2004：§ 14）

吴语语法史研究使用的文献材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明清以来由国人写就的戏曲、小说等文艺著作，如《山歌》《海上花列传》等；另一类是清末以来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写就的文献，其中关于传教士文献的书目可参游汝杰（2002/2021）。《研究》主要使用了第一类文献材料，这方面材料在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依据文献的记载构拟了某个虚词或者结构的历史演变。

《研究》2.1节讨论了吴语指示词“能”及其语义演变，通过梳理《山歌》等早期吴语的材料，认为“能”在吴语史上发生了从指示程度到指示方式的语法创新（71页）。

再比如，《研究》5.1节选取《山歌》《三笑》《海上花列传》三书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吴语的多功能虚词“搭”先有伴随介词的功能，之后才发展出受益介词、方向介词等功能，受益介词是从伴随介词中发展出来的。跨语言来看，从受益介词发展为伴随介词的确是普遍可见的演变路径（Heine and Kuteva 2002：154），而吴语中伴随介词到受益介词的演变颇有特色。

另一方面，利用文献材料厘清了方言中语法成分的兴替。

综合书中5.2、5.3、6.2节，《山歌》时期的苏州方言，可以用“捉”表示处置标记和工具标记，用“听”表示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用“吃”“拨”表示被动标记，与现今苏州话用“拿”表示处置标记和工具标记、“搭”表示受益者标记和伴随者标记、“拨”表示被动标记大相径庭。（也见石汝杰、宫田一郎 2005：前言）《山歌》之外，晚明清初的文献中已经很难见到“捉”做处置介词的用法；在清初之后的文献中，几乎完全没有处置介词“捉”的踪影。正因为有《山歌》的记录，我们才了解到苏州话早期介词系统的面貌，同时也能从中看出苏州话介词系统的历史更替现象。

当然，虽然方言历史文献在历时研究中有重要作用，不过在使用文献时，也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石汝杰、宫田一郎（2005：15）已经指出“很难得到纯粹的方言资料”，方言文献中往往会夹杂非口语的官话成分，需要对其进行离析。《研究》就非常重视对吴语成分和官话成分的剥离，书中6.2节

第2期最终.indd 154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发现，在晚明以来的吴语文献中，“把”“拨”并存，书中“把”实际上体现的是南方官话，而“拨”才是吴语自身的语法成分。

第二，所有文献都存在解读问题，正确解读文献提供的信息，是研究的重要保障。作者对明清吴语材料较为熟悉，对文献的解读基本上都比较到位，这方面无需赘言。当然，《研究》对部分文献的解读也还存在可商之处。书中6.1节讨论早期吴语的多功能虚词“等”，认为《绣榻野史》一书中“等”有给予义，书中举出如下两个例句：

（1）你肯再把阿秀等我弄一弄罢。　（2）我怕你病，安排药来等你吃，你倒要自死。

不过正如书中所言：“受材料的限制，《绣》中未见‘等$_{1}$’（笔者按：指给予动词的用法）在处置、兼语等句式以外的结构中出现”（239页）。书中所举这两个例子并非双及物结构这种给予动词出现的典型环境，因此对于句中“等”的解读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刘华丽（2014）就认为这两个例子不能理解为给予义：例（1）是广义处置式，不能从中推导出“等”有给予义；例（2）是一个兼语句，也仍应该理解为允让义的致使动词。①

《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明清以来国人写就的文艺著作，基本没有涉及清末以来的传教士文献，也较少涉及反映浙江吴语的历史文献，这不得不说是该书的一大遗憾。

1.2　文献的局限性

方言历史文献虽然在方言历时研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不过受文献本身的局限，也给利用其进行方言语法史研究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文献的次方言基础及作者背景等问题不易确定。

石汝杰、宫田一郎（2005：16）已经指出，吴语文献中“次方言的分辨也相当困难”。例如《研究》6.1.1节主要考察了晚明清初的艳情小说《绣榻野史》中“等”的多功能用法。《绣榻野史》的作者吕天成是浙江余姚人，但是根据笔者调查，在余姚及其附近的原绍兴府、宁波府内，均不存在只表示允让、被动等功能的“等”②，因此该书的语言背景就成了需要考察的问题。

再比如，在部分清代文献如《三笑》《合欢图》中，用阳声韵字“本”表示其他文献中具有给予动词、被动介词等多功能写作“拨”的词，“本”和“拨”的关系问题也成了吴语历史语法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话题。除了《研究》的讨论之外，刘丹青（2003：205）、张敏（2011）、盛益民（2018a）等均有讨论。在现代吴语中，像“本”这样读成阳声韵的，主要分布于松江、金山、海盐、萧山等地，《三笑》的编撰者吴信天正好是清代金山县张堰人，编撰者的方言背景不得不让人怀疑“本”可能是吴信天的母语金山话的反映。

第二，方言文献的时代限制。

吴语成篇文献的上限在明末，明末之前吴语语法史的探究基本上无法利用文献进行。比如《研究》2.1节指出晚明吴语中“能”具有程度指示词的功能，而“能”这种功能的来源，则无法借助现有方言文献来

① 此外，本刊匿名评审专家指出：《研究》141页例（2）“蓝氏先起来，床上缠了半日脚，穿好衣服，又去对镜子掠头”一例中，对“日脚”的解释是“为时量词，相当于‘天’”，断句有误，其中的结构当为“缠了[[半日]脚]”。

② 林素娥（2015a）指出，在清末的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有一个多功能虚词“等”，可以表示受益者标记、伴随者标记、等比标记和并列连词等多种功能。不过，两者恐怕并无继承关系：一方面，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等”与《绣榻野史》中的“等”功能差异较大；另一方面，盛益民（2018a）已经证明，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等”并非本字，是另一个多功能虚词“搭/得”增生鼻音尾的记音字。

第2期最终.indd 155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进行考察；再比如在明末的文献《山歌》中，“拨”具有给予动词、允让标记、被动标记等多项功能，张敏（2011）详细论证了“拨”的本字是“把”，其给予义来源于“把”的持拿义，不过吴语的历史文献也无法为这种说法提供佐证，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方能一探究竟。

第三，方言文献的地域限制。

吴语的传统文献主要集中在苏州及附近地区，偶有浙江吴语的记录，但也难以确定次方言归属；传教士文献则集中在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大城市。除此而外的吴语方言点，尤其是广大浙江吴语，均没有太多历史文献材料。因此仅凭文献考证法，无法进行完整的吴语语法史（尤其是浙江吴语语法史）的研究。

因此，结合共时、历时的比较研究，成了吴语语法史研究必须采用的方法。《研究》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二　比较研究与方言语法史

汉语方言史是一部内部创新演变与外部方言接触共同推动的历史。下面两个小节结合《研究》，分别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

2.1　自然演变及其研究方法

利用比较方法研究方言语法的自然演变，主要是跨方言的历史比较和单一方言基于共时语法化的构拟这两种方法。两种方法《研究》都使用到了，下面分别介绍。

2.1.1　跨方言的比较研究

在跨方言比较研究方面，《研究》主要使用到了以下两种比较：

一方面，是吴语内部次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同源语素在不同吴语次方言中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通过不同方言材料之间的参差，可以构拟该成分的演变路径。例如《研究》6.2节指出，“约⁼”[①]在江西玉山方言中可以表示持拿义，在广丰、缙云等地可以表示给予义；而在金华汤溪方言中，则可以表示持拿义、给予义、允让义和被动介词。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并结合语法化、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其构拟“持拿义>给予义>允让义>被动介词”的演变，这也是汉语方言中较为普遍的语法化路径。

另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吴语、闽语、北部赣语等方言具有共同的源头，其源头学界称为古江东方言（梅祖麟 2001等）、古吴语（丁邦新 1988）、共同吴闽语（陶寰 2018等）。因此进行吴语、闽语等方言的外部比较，也是吴语语法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研究》2.2节涉及吴语与赣语、闽语等方言指示词“尔”的比较；而第7章全章从吴闽比较的角度探讨吴语虚词的演变，比如7.4节将吴语的单数后缀“侬”与闽语的复数后缀“侬”联系起来[②]，7.5节把常州地区的疑问代词“底”与闽语联系起来等，均为古江东方言语法史领域的重要研究。

当然，《研究》在进行吴闽比较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书中2.2.3.3节和7.3节同意并发展了李如龙（1999）的观点，将闽语学界一般认为本字为“许”的h-声母远指代词认定为来源于“尔”，文

① “约⁼”在浙南吴语中也有捡拾义（项梦冰 2014），其持拿义可能是从捡拾义发展而来的。关于捡拾义到持拿义的演变，请参张敏（2011）。

② 盛益民（2019）也专门讨论了汉语东南部方言代词后缀“侬”的历史演变，可参看。

第2期最终.indd 156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章引用了李如龙（1999）提出的两方面证据：第一，从声母来看，h-是日母在闽语的白读层，如泉州方言：耳hi^{4}、燃hiã^{2}、箬hioʔ^{8}、肉hiak^{8①}、喏hia^{4}、诺hioʔ^{8}；第二，从韵母角度看，h-声母远指代词的韵母与支韵也能形成对应。不过，李如龙（1999）和《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闽语日母读h-的字一律为阳调类，而h-声母远指代词则多为阴调类（李如龙 1999），因此从语音的角度并不支持闽语h-声母远指代词来源于日母字“尔”[②]。本文同意潘悟云、陶寰（1999）等文的观点，认为闽语的h-声母远指代词本字为“许”，至于韵母的复杂情况，则是因为闽语指示词多为合音形式之故，可参黄瑞玲（2017）等的详细讨论。

对于古江东方言语法面貌的考察，梅祖麟（1988），梅祖麟、杨秀芳（1995）的系列研究导夫先路，《研究》在这方面又做了诸多有益探索，这也是值得吴语、闽语、徽语、赣语等相关研究学界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2.1.2　共时语法化取径

语法化的不同阶段可以在同一个共时层面上并存（layering）。根据语法化的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假说，可以把这种语言共时层面的不同状态分析为语言演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因此，对共时层面的不同成分进行语法化的构拟，成了语法化研究的重要取径。（Hopper and Traugott 2003；Croft 2003；Heine and Kuteva 2007）这种研究取径可以称为“共时语法化取径”。

《研究》对趋向动词“开”和“下”演变为时体助词的构拟，就主要利用了共时语法化的研究取径。书中4.3节指出“开”在常熟方言共时层面中有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准完成体标记等多项功能，根据其他方言的平行例证以及语法化的单向性假说，书中为其构拟了“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准完成体标记”的演变路径。

在历史文献中，同一本书也可能记录下了某个虚词不同演变阶段的功能，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语法化的构拟，也是共时语法化取径的一种体现。《研究》对明清吴语中“能”语法化的构拟，正是这方面的体现。“能”在明清吴语中具有程度指示词、框式结构后置词、指示词后缀、副词后缀等功能，书中据此构拟了“程度指示词>框式结构后置词>指示词后缀>副词后缀”的演变路径。[③]

当然，构拟语法化路径的同时，最好能对演变的动因与机制做出讨论，这方面《研究》恐怕稍显不足。

2.1.3 小结

郭必之（2015）指出，通过方言/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去构拟语法，在西方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并不新鲜，但是对于汉语方言研究而言，较难执行，也极少派上用场，主要的原因在于：次方言的语法材料非常缺乏，而且不容易找到彼此之间的对应。

对于吴语而言，除了上海、苏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的语法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之外，其他地区的语法材料极度缺乏，而吴语语法面貌又极为复杂。材料所限，吴语语法史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历史比较的基础，这也是学界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之处。

① 原书声调为 4，当为 8。

② 感谢曾南逸副教授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③ 根据我们的考察，汉语方言中较常见的演变路径是“性状方式指示词＞比况助词（书中叫‘框式结构后置词’）”，比如林华勇（2008）指出广州话的性状方式指示词“嘅样”、廉江的“嘅式、嘅势”发展出了比况助词，盛益民（2011）指出绍兴话的性状方式指示词“介话头”也发展出了比况助词的功能。不过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山歌》中并没有“能”指示性状方式的用法，因此，是性状方式指示词和程度指示词都可以发展为比况助词，还是《山歌》中没有记录“能”指示性状方式的功能，尚需进一步研究。

第2期最终.indd 157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2.2　方言接触问题

接触频繁是汉语方言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现象，因而方言接触也就成了方言语法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所涉方言接触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官话对吴语的影响，这是吴语语法史研究中方言接触问题的重要方面。《研究》多处讨论到官话对吴语的影响，如207页认为北部吴语表示伴随、并列的虚词“同”是南宋以后南方官话成分的孑遗；213页认为“教/叫”从使役动词发展出连-介词的用法，可能是从早期长江下游的南方官话开始的，之后才影响到受官话影响比较显著的宣州片、太湖片的毗陵小片和苏沪嘉小片；249页认为吴语文献中的“把”是宋元以后南方官话影响吴语的结果。

笔者在“引言”部分已经提到，汉语方言史研究并非通语史研究的附庸，因此研究方言语法史不能直接在官话文献中寻找源头；在利用方言文献的过程中，也要排除其中的官话成分。当然，官话文献在方言语法史研究中也会有其独特的作用，如果剥离出了方言中的官源成分，那么官话文献正好可以起到时间标尺的重要作用。如《研究》提到北部吴语表示伴随、并列的虚词“同”是南宋以后南方官话成分的孑遗，这个论断的前提就是“同”在宋代已经有表示伴随、并列的功能。根据马贝加（2002：201—205），“同”在唐诗中已经有比较典型的伴随介词用法，这种用法在宋代就已经非常常见；而席嘉（2010：34）等研究表明，“同”在宋代的官话文献中也已经发展出并列连词的功能。由于“同”主要分布于杭州一带的北部吴语中，且浙江官话的并列连词就用“同”，所以盛益民（2018b）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认为“同”是宋室南渡之后汴洛移民带入吴语的成分。

另一方面，吴语的次方言也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接触影响。《研究》指出，在明清吴语文献中，“搭”在苏州方言中就非常普遍了。林素娥（2015b）考察发现，早期上海话传教士文献多用送气声母的“脱/忒”，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不送气声母的“搭”；林素娥（2015b：182）同时发现，出现“搭”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好是苏州话影响上海话最剧烈的时期，同一时期苏州方言的疑问副词“阿”也进入了上海话，所以认为“搭”也是从苏州话扩散到上海话中的。杨阳（2021）考察了从1850年代到1930年代的九种上海方言传教士文献，发现早期文献中“搭”已有并列连词的用法，其伴随介词、受益介词用法要较晚才出现，并怀疑后两种功能的扩展才与苏州话的影响有关。[①]语法形式在吴语内部次方言之间的传播与影响，之前较少为学界关注，是亟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领域。

当然，外方言的成分一旦进入本方言，就成为本方言的成分，也可以发展出一些源方言所无的功能。如《研究》提到的官源虚词“同”，就在不少浙北吴语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桐乡方言的“同”不仅可以表示伴随和并列，还可以引介言谈对象和受益者（桐乡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4）。“同”引介受益者是官话文献中所不具备的现象，乃其进入吴语后经历“伴随介词>言谈对象标记>受益介词”这一语义演变的结果。

三　总结与展望

《研究》是吴语语法史（尤其是虚词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探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结合

① 在上海郊区的嘉定、崇明、松江等也是以送气的 $t^hə?^7$ 为主，基本上没有不送气的“搭”类成分。而开埠时期的上海话就使用“搭”作为并列连词，其间的差异尚需进一步探究。

第2期最终.indd 158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研究》的相关研究，对其中所用到的探索方言语法史的方法和相关问题做了简要梳理。

当然，包括吴语语法史在内的汉语方言语法史研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我们觉得汉语方言语法史是一部自然演变与语言/方言接触相互交织的历史，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大致需要结合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离析自然演变与语言/方言接触这两类不同的演变机制。当然，如何离析是一个颇为复杂且重要的理论问题，语音研究领域的层次分析法在这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余蔼芹（Yue-Hashimoto 1991）等文献开始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第二，对于自然演变的现象，不仅要利用文献考证，更要结合语法化、历时类型学等相关理论，构拟其具体的演变过程，并对相关演变的机制与动因做出阐释。

第三，对于语言/方言接触的现象，在参照权威方言（尤其是共同语）语法史的基础上，利用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理论模型来具体考察接触的机制。

而在研究方法上，汉语方言语法史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引入语义图模型、共时变异、各类计量方法等。吴福祥（2011）指出，在缺乏历时资料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语义图模型来研究多功能语素的语义演变或语法化路径，从而对多功能语素的历时动因做出解释”。Pintzuk（2003）对通过共时变异考察句法演变的研究方法做了综述；Viti（2015）中有五篇文章涉及使用语料库方法来研究历史句法演变；而Ledgeway和Roberts主编的《历史句法学手册》（Ledgeway and Roberts 2017）的第二部分是对方法与工具的讨论，除了介绍常用的比较法与内部构拟法之外，还着重讨论了基于语料库的计量方法和系统发生构拟法（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相信新方法的引入，一定能进一步大力推动汉语方言语法史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丁邦新（1988）吴语中的闽语成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9本第1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

郭必之（2015）原始粤语怎么样表达动作/状态的完成？《东方语言学》第十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黄瑞玲（2017）广东揭阳方言的指示词及其复音化-合音循环圈，《语文研究》第3期。

李如龙（1999）闽南方言的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林华勇（2008）试论粤语的比况范畴，王吉辉、刘晓红、王泽鹏编《金秋集——刘叔新先生南开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

林素娥（2015a）一百多年前宁波话连-介词“等”的用法及其来源，《语言科学》第4期。

林素娥（2015b）《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基于西儒吴方言文献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刘丹青（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北京。

刘华丽（2014）汉语“等/待”使役结构历时考察，（韩）《东亚文献研究》第14 辑。

马贝加（2002）《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北京。

梅祖麟（1988）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北京。

梅祖麟（2001）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第1期。

梅祖麟、杨秀芳（1995）几个闽南语语法成分的时间层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1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

潘悟云、陶　寰（1999）吴语的指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盛益民（2011）《绍兴柯桥话指示词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盛益民（2018a）从特殊音变看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兼论苏沪、宁波方言多功能虚词“搭”的非

第2期最终.indd 159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

同一性，《语文研究》第4期。

盛益民（2018b）宋室南渡与临安官话对吴语的影响——若干词汇、语法的例证，《语言暨语言学》第19卷第3期。

盛益民（2019）复数单数化与汉语方言单数代词中后缀“侬”的来源——一项语义创新及其对东南方言代词系统的影响，*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1. Leiden：Brill Publishers。

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2005）《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陶　寰（2018）吴闽语云、匣母的读音和闽语全浊声母的清化，《中国语文》第3期。

桐乡市地方志办公室（2014）《桐乡方言志》，方志出版社，北京。

吴福祥（2011）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语言研究》第1期。

席　嘉（2010）《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项梦冰（2014）汉语方言里的拾取义动词（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北京。

杨　阳（2021）《从传教士文献看上海方言连-介词的历史演变》，复旦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游汝杰（2002/2021）《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张　敏（2011）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类型学研究引发的新问题，《中国语言学集刊》第四卷第二期，中华书局，北京。

郑　伟（2017）《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Campbell, Lyle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2nd ed.).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Alice C. and Lyle Campbell (1995)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7)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dgeway, Adam and Ian Roberts (ed.) (2017)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ntzuk, Susan (2003) Variationist approaches to syntactic change. In Brian D. Joseph an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509-528. Oxford: Blackwell.

Viti, Carlotta (ed.) (2015)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Yue-Hashimoto, Anne O. (1991)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al grammar: A case in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2): 172-201.

Textual,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Historical Syntax: A Review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nctional Words in the Wu Dialects* by Zheng Wei

SHENG Yimin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 review of Zheng Wei’s monograph entitled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nctional Words in the Wu Dialect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dialects. Meanwhile prospects are proposed for futur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syntax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nctional Words in the Wu Dialects,* textual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Chinese dialects historical syntax

200433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shengym@fudan.edu.cn

第2期最终.indd 160 2023年02月22日 星期三 9:27:33